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续上期)

作为20世纪初的一位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沈祖荣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

沈祖荣先生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理想是通过办理图书馆事业来实现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1910年,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决定供职于文华公书林,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当时对于他的这一抉择,旁人不可理解,亲朋好友谁都不赞成。当面阿谀奉承者说:“方今各处需才孔亟,以你大学毕业,何事不可为?乃作此招护书籍的事业,不其长才短驭?”背地里议论,不是说:“毫无远志”,就是说:“学识平庸,不能充当学校的教员,不能做洋行的买办或写字,只有涸亦书丛,做书班的事,这种整理书籍的工作,花费数元,雇一个失业的书贾担任足矣,何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反去做这种工作,真不可解”^[7]。类似的冷嘲热讽,在风气未开的当时虽然使沈祖荣先生压力重重,但是他只能付之一笑,其立志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

在留美期间,沈祖荣先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量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因为“学校乃是人民受教育的场所,博物馆艺术馆是保藏国宝的机构,人民能在其中学习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亲身接触世界的杰作。图书馆,正如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的大学’一样,是民众日常摄取其知识粮食的机关”。在经历了心灵深处的剧烈的进步与落后、富强与贫弱的震撼之后,沈祖荣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中国拥有富强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学校和大学的话,我就不会对中国的软弱无能感到懊悔,但是,我现在为一个没有这样令举国感到自豪的教育机构的国家感到羞愧。我将来不会去详研学校制度,也不会去建造博物馆和艺术馆,但是,我会为图

书馆事业奋斗终身。”^[8]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沈祖荣先生向全国图书馆界呼吁:“敌人强夺我土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而后快。我们虽然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负责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这不仅可以恢复我们的国性,而且可以使敌人看见吾民族非凉血动物。^[9]“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教育工作者最应紧张进行工作的时候。现在打仗不专是靠武力的;没有钱我们不能打仗,没有粮食我们不能打仗,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没有钱,我们可以向别国借贷;没有粮食,我们也可以设法购运;可是教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平太低,致使国民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即使有较好的国际友人,也将爱莫能助”。“一个国家整体国力的养成,完全靠着教育。我们现在能向日寇面对面拼一气的,就是靠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增强的教育力量。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我们的战士却有以血肉作长城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由教育而产生的。图书馆应担负起‘前方将士精神粮食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育’的职责”^[10]。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文华图专被迫迁往四川重庆期间,虽然文华图专的校舍几次惨遭日寇飞机的轰炸,片瓦不存,但是,沈祖荣先生仍然能够在风餐露宿、奔走于日寇炮火之下、教学于敌机轰炸之间隙的危难时刻,维持文华图专,并且还创办了档案管理科,其艰苦卓绝的图书馆精神受到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广泛颂扬,成为中国图书馆人的楷模。

早在1930年时,毛坤先生就对这种“维持人之精神”做过清晰地说明:“语云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诚哉言矣。图书科自创办而后,使无沈祖荣胡庆生两先生辛苦维持,图书科早已烟消云散矣。二先生皆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科。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全校事物教务皆亲任之。口无余暇,手不停批;面命耳提,循循善

诱。15年武昌围城,16年时局混乱;其他学校皆已停办,独图书科赖二人之力仍得维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其谓是乎?^[11]

作为一个中国人,裘开明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地奉献给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

我们只要全方位地审视一下裘开明先生的人生理想与历程,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首先,裘开明先生的人生理想与图书馆精神来自于他的老师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他所体现的是文华图专的“学生之精神”。对于这种“学生之精神”,毛坤先生在1930年时亦做过精辟地论述:“我国学子,往往心神不定,见异思迁。学工学而入教育,学教育而入政治,比比皆然,习非成是。其紊乱系统,减低效能,莫此为甚。惟文华图书科之毕业学生,对于此点,至足称道。总计各届毕业生已有五十余人,除业新闻及警务各一人而外,全数皆在图书馆服务。而图书馆事业至为繁苦,自朝至暮,饮食而外,无休息之时。且在今日图书馆员者,地位低微,报酬亦啬。见异思迁之士,鲜有能忍受之者。而文华图书科诸同学,安之若泰,且益发奋,其忠于所学,为何如哉?”^[12]因此,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精神是文华精神的种子在美国图书馆界开花结果的体现。

其次,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虽然裘开明先生的图书馆生涯基本上是在美国,但是,他一直保持着对祖国和中国文化学术的眷恋和热爱。这种情结通过数十年自觉地抢救和保存中国珍贵文献而得以充分表现。1976年,裘开明先生在多伦多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第28届年会上曾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历史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个说明是我们今天了解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与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裘开明先生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抗日战争以前时期(1928~1937);(2)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3)抗日战争以后时期(1945~1965)。相信各位专家学者仅从这种历史分期的标题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裘开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集是通过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非正式协议进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发动“芦沟桥事变”以后,建立了所谓的华北政府。许多中国学者都纷纷躲避,以拒绝接受华北傀儡政府的任职。同时,由于经费的严重拮据,中国学者不得不通过出卖其私人藏书中的珍本以维持生计。那时,许多日本的游人和汉学家都涌入北京,在北京的琉璃厂和隆福寺收购中文书籍。其时,适逢裘开明先生在北京督促《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的

印刷工作,为了尽可能不使中国古籍落入日人之手,于是,他在北京与日本学者和侵略者展开了购买中文古籍的争夺战,并使之延续了四年之久(1937~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接管了燕京大学,一些教授因为拒绝与日本傀儡政府合作而入狱,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北京购买书籍的工作停止了,并转向中国后方。裘开明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后时期,日本战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古籍流落日本市井,“我们开始将收集中文书籍的工作转向日本。在1950年前后,我们直接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的知名书店购买中文古籍,并与日本的各个机构和个人,尤其是东洋文库和日本国会图书馆,展开了中文图书收购竞争。我们一收到书目或书影,就立即开始核对我们的公务目录和订购档案,常常工作到深夜,然后,立刻用电报进行订购,以便日本书商能够连夜或在次日早晨将书寄出。即使我们用这么快的速度来发订单,也无法保证能够买到我们想购买的书。我们发现:在日本购买的许多中文古籍都来自华北。总之,哈佛所购得的大多数中文书都是日本人和中国游人在战时从北京和其他沦陷城市带到日本的。”^[13]

我想:裘开明先生的这些直白可以说明我上面的论点。当然,它也比较明晰地回答了不少中国学人心中的一个问号——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这么多中文古籍究竟是怎么来的?言下之意是:是不是像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盗窃中国敦煌卷子那样得到的?在我初到哈佛时,郑炯文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陆曾有两位校长访问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一位不断地问郑炯文先生我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另一位略知原委者只好代答道:如果不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些中文古籍恐怕很多早已烟消云散了。我想这个回答不仅缓解了问者心中的疑惑,而且也是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裘开明先生历史功绩的一种肯定。如今,郑炯文先生秉承全面开放馆藏的传统,并以多种方式使中文古籍反馈中国学人。这无疑是裘开明先生人生理想的延续。

其三,裘开明先生对于哈佛的贡献,其表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其实在哈佛的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可以说,裘开明先生献身于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乃是其弘扬东亚文化学术,尤其是中国文化学术之理想的最终归属。翻开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崛起、繁荣、兴盛基本上是与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一致的。从梅光迪、叶理绥到赖肖尔、费正清、杨联陞等,哈佛大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在这些著

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和学者辉煌的背后一直挺立着一位最忠实的支持者——裘开明先生。如果没有裘开明先生,那么我们就难以想象哈佛燕京图书馆今天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也很难想象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今天的成就。

人们常说:哈佛的中国研究蜚声国际,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之执牛耳者。其有今日之地位,部分是因为时势造就,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谋所致。人才、图书、资金乃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傲视全美之三大要素。我认为在“图书”这一大要素之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人的贡献又是最为关键的。从筚路蓝缕的裘开明先生,到发扬光大的吴文津先生,直至继往开来的郑炯文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人始终在哈佛东亚研究中扮演着默默无闻的重要角色。

裘开明先生正是这种春风化雨的典范。费正清教授曾说:“我认识裘开明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间,裘开明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当然,他变老了,我也一样,但是他总是那么友善、热忱、兴致勃勃和乐于助人。他文献知识渊博,并以向他人传授这些知识为一种快乐。”我们与这位奠定了我们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基础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缔造者一直具有友好的专业关系,在长久的共事之后,赖肖尔教授、Craig教授和我非常自然地把我们编写的1965年版教科书*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题献给了裘开明。我们的献辞写道:“献给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1927~1929)、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1929~)裘开明”——我们这样有点精确地描述行政职务是为了表明:裘博士最初是一个文库主管,后来建立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藏书——简言之,裘博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先驱。他是我的兄长,从我接触哈佛开始,他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哈佛引人入胜的一道风景,以致我领受他那父亲般的风采简直就如同领受一份礼物,的确,我所领受的那父亲般的风采就是一份礼物——一份具有献身人格的珍贵礼物。^[14]我想,费正清教授在1978年所发表的这一段文字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且也道出了许多哈佛东亚研究专家学者的心声。

由此可见,虽然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图书馆精神——“智慧与服务”。他们在实现其异曲同工的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和演绎了这种图书馆精神。这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生理想唱和。

3 “跨越时空”——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精神力量

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更是跨越时空的。如果说韦棣华女士是一座跨越太平洋连接中美图书馆事业的桥梁的话,那么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则是支撑这座桥梁的两端的桥头堡和向两地延伸的主干线。因为这座桥梁及其主干线的作用,他们的事业、他们的精神在中美图书馆界之间、在自20世纪初以来的几代图书馆人之中一直在不断发扬光大。

2000年11月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举办“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8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期间,我曾应邀专门举办过一个题为“永恒的文华精神——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历史回顾”的图片展览。在这个图片展览的前言中,我曾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中,‘文华’这个光辉灿烂的名称不仅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创始,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运动的中心,而且代表着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因为‘文华人’不仅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而且演绎和推动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如果没有‘文华’和‘文华人’,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将不可想象。”在此,我不想过多地论述文华图专对中国大陆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我只准备谈谈它对大陆以外地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正是我要说明的“跨越时空”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图书馆学家严文郁先生曾对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倾毕生之精力创办和发展的文华图专对大陆以外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做过一个简洁的说明。

严文郁先生说:“以台湾图书馆教育而论,蓝乾章、沈宝环、周骏富三位教授在台大、师大、辅仁、淡江及世新五个图书馆学系组造就专业人才数千人,这些后起之秀,也可以说是韦、沈二师的再传弟子,一脉相衍,若是寻根,当追溯到武昌文华。绍期师一生只作了一件事,服务一个机关,因为他敬业乐业,他的弟子受其潜移默化的感召,个个以图书服务社会,埋首耕耘,使图书馆事业扎根,成长、茁壮,事虽小而影响学术、文化与教育者至大且巨。”^[15]

严文郁先生又言:“文华图专虽属袖珍型的学校,先后毕业学生不过二、三百人,除打进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外,出国深造的比例相当高,现居美国者尚有十多位,虽皆垂垂老矣,可是他们曾为美国著名大

学的东亚图书馆奠定基础。^[16]

的确,只要稍微留心一下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华图专毕业生对美国东亚图书馆的重大作用。据我初步估计,大约有不低于十分之一的文华图专毕业生曾为美国的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做出过贡献。例如:曾经服务于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桂质柏先生,曾经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严文郁、汪长炳、岳良木、徐家壁等先生,曾经服务于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王文山、曾宪三、李芳馥、房兆楹、徐亮、张葆箴、陶维勋、吴宝珠等先生,曾经服务于普林斯顿大学哥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董世纲、吴元清等先生,曾经服务于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顾家杰先生,以及先后服务过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查修、曾宪文(裘开明夫人)、徐家麟、杨漪如、姜文锦、黄慕龄、舒纪维、富兰英、聂锡恩、黄作平等。

当然,哈佛燕京图书馆更是不会例外。在“裘开明时代”,哈佛燕京图书馆几乎是文华图专毕业生的天下。自馆长裘开明先生开始,到副馆长冯汉骞先生、于震寰先生,直到业务骨干陆秀、黄星辉、任蕻、邓衍林等近10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文华图专毕业生。虽然目前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服务的文华图专再传弟子只有几位,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中国的文华图专,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它都与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很近很近。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就可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感觉到文华图专及其影响——文华精神的存在与延伸。这也正是我选择“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作为我的这个报告的目的原因之一。

我在这个报告的开头说:“裘开明先生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东亚图书馆先驱和华美图书馆学家。”这绝不是因为我在研究裘开明先生就一味地过高地评价裘开明先生,而是事实的陈述。因为作为在太平洋此岸连接中美图书馆事业桥梁的桥头堡,裘开明先生不仅是这座桥梁向美国东亚图书馆延伸的主干线,而且还是进一步向世界东亚图书馆辐射的枢纽。从这个角度来讲,裘开明先生不再仅仅属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而是属于整个西方的东亚图书馆事业。这里,我姑且不谈裘开明先生在荣休以后远赴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筹建其东亚图书馆和出任香港中文大学首任馆长等方面的贡献,我仅就“裘氏法”——《汉和图书分类法》的影响做一点说明。

20世纪70年代初,赖永祥先生曾对裘开明先生的《汉和图书分类法》(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在世界各国的使用情况做过一个调查。赖永祥先生的调查结果显示^[17]:在全球五大洲之中,除了非洲以外,有四个大洲的东亚图书馆使用裘开明先生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其中:亚洲和大洋洲有7个图书馆,欧洲有3个图书馆,美洲有15个图书馆。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亚洲和大洋洲:

- (1) 中国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49年以前)
- (2) 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Singapore)
- (3) 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
- (4) 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 C. T.)
- (5) 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文库(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Oriental Language Collection, Canberra, A. C. T.)
- (6) 新西兰奥克兰: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图书馆(1966年——, University of Auckland, Asian Languages Library, Auckland, New Zealand)
- (7)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67~1971年)

其二,欧洲:

- (1) 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图书馆(Library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Leyden, Netherlands)
- (2) 英国:牛津大学中文学院图书馆(Oxford University, Chinese Faculty Library)
- (3) 西德汉堡:汉堡大学图书馆东方文库(University of Hamburg Oriental Collection, Hamburg, West Germany)

其三,美洲:

- (1) 哈佛燕京图书馆
- (2)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
- (3) 耶鲁大学远东文库(1970年以前, 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Collection)
- (4) 普林斯顿大学哥斯德东方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Gest Oriental Library)
- (5)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University of Chicago, Far Eastern Library)
- (6) 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ast Asiatic Library)
- (7)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1967年以前,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Far Eastern Library)
- (8) 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中文文库(Hoover Institute

Library, Chinese Collection)

(9) 图森亚利桑那大学东方研究图书馆(1970年以前,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Oriental Studies Library)

(10) 洛杉矶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1972年,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Oriental Library)

(11)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东亚图书馆(1970年,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East Asian Library)

(12)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日文库(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hinese and Japanese Collection)

(13)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库(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East Asian Collection)

(14) 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 Far Eastern Department)

(15)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部(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Asiatic Department)

我想, 上面的这份调查表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我所要说明的问题。最后, 我谨以我本人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智慧与服务》所写的说明词来结束我的报告:

我们崇尚智慧, 因为——

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
智慧是知识的光芒,
智慧是理想的闪光,
智慧是生命的灵光。

我们至诚服务, 因为——

图书馆是信息的海洋,
服务是馆员的天职,
服务是智慧的土壤,
服务是人生的弘扬。

参考文献

- 1 Samuel T. Y. Seng.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文华图书科季刊(英文之部), 1931, 3(3)
Cheng Huanwen.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from An American Librarian to 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见: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编. 两岸三地图书馆管理与技术. 澳门图书馆暨资讯管理协会出版, 2000, 1: 85~101
- 2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台北: 学生书局, 1997
- 3 Alfred Kaiming Chiu. Reminiscence of A Librari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1964-1965): 7~18
A. Kaiming Chiu, 1898-1977. HUL Notes—News & Note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No. 447, 24 November 1977
Eugene W. Wu. A. Kaiming Chiu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e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 file: A. Kaiming Chiu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ugene W. Wu. The Founding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 101 (December 1993): 65~69
- 4 Alfred Kaiming Chiu. Reminiscence of A Librari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5 (1964-1965): 7~18
- 5 毛坤. 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十周年纪念.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0, 2(2): 137~139
- 6 毛泽东. 纪念白求恩. 见: 毛泽东著作选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345~347
- 7 沈祖荣. 在文华公书林过去19年之经验.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29, 1(2): 159~175
- 8 Samuel T. Y. Seng. Difficult Problems of the Librarian in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 12 (January 1917): 19-24, Vol. 13 (February 1917): 161~166
- 9 沈祖荣. 国难与图书馆.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1932, 4(3): 223~234
- 10 沈祖荣. 图书馆教育的战时需要与实际.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 13(4): 4~6
- 11, 12 毛坤. 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十周年纪念. 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0, 2(2): 137~139
- 13 A. Kaiming Chiu.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e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 file: Papers: A. K. Chiu
- 14 John K. Fairbank. Recollection of Dr. Chiu. 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Bulletin. No. 55 (March 1978): 8~9
- 15, 16 严文郁. 图书馆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为其百年冥寿纪念而作. 见: 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 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出版. 1983: 253~258
- 17 Lai Yung-hsiang. Cataloguing At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ccomplishments and Prospects. Se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File: Library Managing Committee-Minute 1972

程焕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管理系教授, 广东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通讯地址: 广州市. 邮编 510275.

(来稿时间: 2002-03-19)